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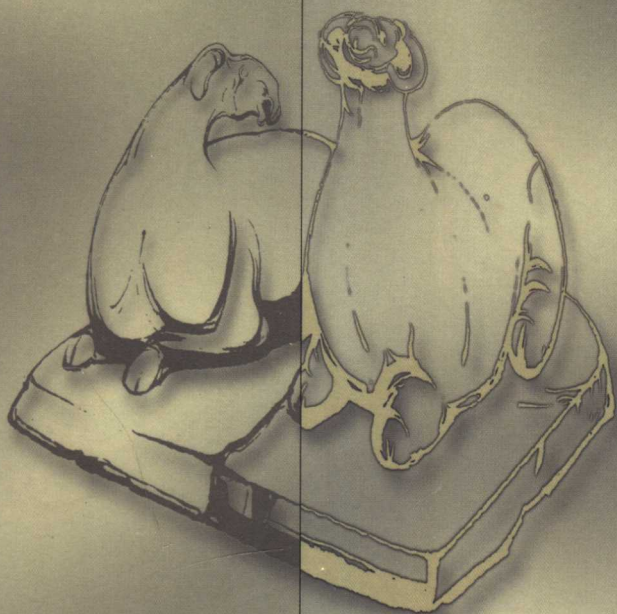
天下论丛

以善致善

蒋庆与盛洪对话

Towards Peace by Peace

蒋庆 盛洪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以善致善

Towards Peace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299190

B222.05

J572

天下论丛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7298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蒋庆,盛洪 著.

(天下论丛)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2

ISBN 7-5426-1868-7

I. 以… II. ①蒋…②盛… III. 儒家—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921 号

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

著 者/蒋 庆 盛 洪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范桥青

监 制/沈 鹰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anlian @ online.sh.cn

印 刷/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8.5

印 数/1—5000

ISBN7-5426-1868-7

G·639 定价:20.00 元

《天下论丛》总序

盛洪

中国文人有谈论“天下”的传统。但是近一百年来，他们谈论得少了。他关注的，不是“天下”，而是“国家”。这或许是因为，他过去关心的“天下”，是以天下形式存在的国家（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而近代以来其他文明的挑战者使他们发现了“天外有天”；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悠哉悠哉谈论天下的前提，是有一个国家作为屏障。近代以来，这个屏障被打破了，他

们都忙着“救亡”，哪有工夫谈论天下。

然而今天，我们似乎有理由恢复这个古老的传统。这首先是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救亡任务基本完成。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第一等强国，但她至少没有灭亡之忧。这使中国的文人，有一些工夫看一看天下了。并且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小国”变成“大国”的过程。这不仅指实力上的，而且指心理上的。由于中国人的庞大规模，人均收入的增加必将使中国聚合成一个经济巨人。无论中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是否愿意，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必将改变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必将转换为广泛的文化影响。中国的事情注定要有天下意义。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孤立于世界的状态中。今天在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影响中国的命运。中国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关注，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其他部分一体化到了何等程度。即使那些看来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只要涉及对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就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中国迟早要面对经由这些事件形成的规则。最后，信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络的开通，使世界又一次走到了战略性转折的关头。尽管我

们还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何种事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新的信息技术只能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之大。因为大，就更接近于天下。正如奥尔森所说，一个局部的群体所覆盖的范围越大，它的利益就越接近整体的利益。由于中国人口占有世界人口的最大比例，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中国人也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关心天下的事情。

而这个天下并不太平，也不完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说明，那种通行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规则，还在隐蔽地支配着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货币体系的相继崩溃暗示，产生于市场的新的金融技术，又有可能成为摧毁市场制度乃至全球经济的垄断力量；民族、国家、宗教间的对立，恐怖主义的猖獗则告诉我们，信息沟通速度的加快，并不能消除文化间的隔阂，坐在全球网络终端后面的，是互不理解的心。

很自然，我们希望天下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我们愿意作出努力，使这个天下更加符合我们的愿望。但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我们的愿望符合所有其他人的愿望，我们的愿望才是“天下的”。因此，我们对天下的关注，不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谋略，也

不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心态，而应是一种博大的、宽容的爱。与此相应，如果中国能对这个世界有所影响的话，最有可能是通过文化的影响。与经济影响、政治影响，以至军事影响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化如果能有影响的话，对于接受文化影响的人来说，一定是一种福利的增进。所以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

应当承认，谈论这样的话题其实还是刚刚开始。甚至在五年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要谈论“天下”。这种变化和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变化有关。但是与我们的心理准备相比，这一变化来得相当突然，以致我们还没有资格进入主题，就像一个在物质上突然变富的人，心灵还没有丰富起来一样。我们不得不在讨论天下问题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这些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别人，一是认识自己。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眼睛向外，但也许是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任务过于急切，他们对外国的了解过于功利主义，以至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即使他们注视的西方，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也只是被看作希腊传统的现代变型而忽略了，甚至拒绝理解另一个对西方至关重要的文化源泉——希伯来传

统。由于总是与西方较劲，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忽视了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了解。他们一般来说不懂伊斯兰文明，不懂印度文明，更不懂那些较小的文明。他们也不屑于了解这些文明。他们对这些文明的傲慢甚至不亚于某些西方人。

在另一方面，向外关怀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基：一个经济上崛起的民族要有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的话，一个民族所掌握的物质力量越大，它的破坏性也就越大。尽管在传统上，中国有“慎大”之说，但在今天，这种传统似乎已经失落了。很少有人去检讨，中国的道德的增长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而实际上，中国在道德上的灾难，决不亚于那些有形的，如长江洪水带来的灾难。中国既没有从她的传统中发展出新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成功地移植外国的文明，因此人们会担心，中国人是否能驾驭那突然涌流的巨大财富。而这恰恰是意识到中国的天下责任的知识分子所要努力改变的，即在充分吸纳外来文明优秀成分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中国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尽自己的努力，催发和培育中国新的文明。

为了上面讲的种种目的，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天下论丛》*。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纵论天下的地方。天下之大，海阔天空。我们可以有非

*感谢王焱先生，是他提出了“天下论丛”的名字。

常广阔的空间，从经济、政治、军事，到民族、国家、宗教。我们同时也希望，就天下问题的“准备工作”进行讨论，即讨论其他文明究竟如何，以及中国的文化资源究竟如何。既然讨论天下，就要有胸怀。本论丛唯一的规则就是宽容；唯一不能宽容的就是破坏规则。我们期盼着不同学术领域的人进行对话，我们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沟通，我们尊重所有不同见解和主张。

由于天下的问题过于复杂，本论丛也许给不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开辟了一个学术论争的场所，我们开始了一个文化互动的过程。如果文明间的融合与整合不可避免，就必须借助于文化间的互动；如果一个全球文明的形成是解决天下问题的唯一方案，它也只能是文化互动的结果。虽然我们决不低估理性的力量，但只有把它置于更为强大的自然秩序之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学者对自己理论的自信，都应转化为对文化互动秩序的尊重。只要我们遵循这样的规则，只要我们认真地推进《天下论丛》的编辑和出版，它就会给我们带来超越个人想象的、积极的文化结果。

1998年8月30日

在儒学中发现 永久和平之道

——代《以善致善》序

盛 洪

二〇〇二年的春节前夕，我在陈洁的安排下飞往深圳，与蒋庆先生谈了两天。这次对话实际上是以我发问、蒋先生回答为主要形式。目的是要寻求我长期思考、却还“无解”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难题都是当今世界面对的重大问题，用来“刁难”蒋庆，意在激发他的思路，“挤”出对我也对世人有启发的洞见；也是要看一看，强调儒家公羊学传统的蒋先生有什么救治“高招”。尽管我对中华文化充

满敬意，但还没有把握儒学的基本“书法”，所以蒋庆先生的看法经常出我意料，又令我兴奋不已。

当我问到，“中国为了天下主义的理想，能否扩军备战”时，蒋庆先生截然地回答说“不能”。因为“善的目的不能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如果只能用恶的手段，那就宁肯不做。概括起来就是“以善致善”。初听到这个回答时，我大吃一惊。之所以吃惊，一是因为我自以为“刁钻”的问题被他轻易化解，一是因为这个答案我从未想过。在国际政治中，所谓“善的目的”就是永久和平，所谓“善的手段”一般是指和平手段，而“恶的手段”就是战争手段。要想“以善致善”，实际上困难重重。首先在于，如果强调尽量采取和平手段，在实际中则很难对抗暴力手段。其次在于，只选择善的手段需要很强的道德自律，并忍受由此带来的当前损失，这对很多人来说难乎其难。因此另外一种选择，即“以恶致善”，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并且显得合乎“理性”。

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指出，不是和平状态，而是战争状态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大自然的机制”却会使人们通过战争走向永久和平。他乐观地指出，所谓永久和平“这样一个问题是必定可以解决的。因为它并不在于人类

道德的改善，而只在于要求懂得那种大自然的机制我们怎样才能用之于人类，以便这样地指导一个民族中间的那些心愿不和的冲突，使他们自身必须相互都屈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并且必然导致使法律在其中具有力量的和平状态。……大自然的机制就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相互对抗着的自私倾向而可以被理性用来作为它自身的目的，即权利的规定，扫清道路的工具；从而在国家本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就促进了内部的以及外部的和平”（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126页）。而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说得更为直白：“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活动……”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联盟”（第12页）。

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恶致善”。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可能对人类“恶”的本性不抱幻想，并且由于从一个长期的视野讨论问题，即人类经过恶的洗礼后，最终会达到善的境界，并不具体考虑血的代价。同时，康德作为一个西方人，也许没有切身感受过在力量不平衡时，弱势一方所承受的痛苦。然而，即使仅从逻辑上看，康德的“以恶致善”之路并非没有矛盾。在国际上，他所谓一种自私的力量可由

另一种抗衡和抵消的情形，只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成立，即各方势均力敌。只要力量对比悬殊，理性会驱使强势一方尽量利用它的优势。而在人类历史中，力量间的不平衡是常态，平衡则非常罕见。即使在平衡状态中，互相对峙的各方也不甘于这种平衡，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技术的或组织的创新打破平衡，重新占据优势。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就是明证。如果没有伟大道德的强力约束，康德设想的“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作为“和平联盟”的“中心点”（第113页）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按照“以恶致善”的逻辑，具有力量优势的大国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才符合所谓“理性”。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说明了这一点。

康德认为一个社会依赖于权利结构体系就可正常运行，这个结构是由自利的人之间经过对抗形成的。作为一种哲学观念，这种所谓人无需克制私欲，反而具有“合目的性”的说法，可以对应于经济学中的“第一定律”，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意思是说，“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好”。但后来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种情形能覆盖整个社会。曼瑟·奥尔森认为，在有的时候，“无论每位个体如何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最终不会自动产生”。

（“Foreword” to Todd Sandler's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这被称为“经济学第二定律”。它起因于大量的外部性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外部性是指不同的私利互相对抗不能恰好达成均衡的情形,例如分散的居民不能很好地对抗传布污染的工厂。集体行动问题则揭示了,如果没有可操作的合理分摊成本的方案,就无法提供集体产品。很显然,战争或掠夺是更为直接的外部性问题,而永久和平则是世界的集体产品。它们无法通过人的自利行为自动解决或提供。奥尔森提出,必须有相应的组织或制度安排,如政府、工会、卡特尔,或某种国际联盟,才能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实际上这些有形制度不仅各有自身的弊端,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而且还可能产生负面作用。例如政府虽然可能提供公共物品,但如果不加控制,可能会直接侵害公民的利益。

任何社会的有效运转,实际上都要依赖于如权利体系这样的有形制度,和像道德这样的无形制度的结合。道德作为一种自律的制度不仅节约了强制成本,在社会的一些领域中直接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和共识,奠定了有形制度的宪法原则。正是道德,才最后解决了“经济学第二定律”的问题,使社会得以实际存在。由于这一点,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很关注对文化和

道德的研究；近来走红的心理经济学又指出，人们对公共物品作出贡献的意愿，要高于经济人的假设。如果将“社会只需权利体系、而无需道德”的错误理解放大到国际上，认为实现永久和平无需借助道德，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在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以恶致善”的大旗更容易为占有优势的人群所利用。他们为自己所认为的“善”不惜动用武力。而一旦使用“恶”的手段，目的之“善”就会被改变。正如康德所引希腊格言，“战争之为害，就在于它制造的坏人比它所消除的坏人更多”。更何况，人们还可能将自己的私利说成是“善”，甚至以恶为善。我国春秋时期发动战争的都是“仁义之师”，近代世界上有哪场战争不是为“正义”而战？

无论如何，这条“以恶致善”的道路却给予了人类原谅自己恶行的道德辩护。自康德以后又持续了数百年的战争，时至今天，我们也没有感觉到我们离“善的目的”更近了。但“以恶致善”却依然是西方世界对待国际问题的主流的哲学思想。据说，马克沁机枪的发明人的动机，就是要让欧洲人对战争更为恐惧，从而结束战争走向和平。诺贝尔奖设有和平奖，不无讽刺地，在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九一八年，一个发明了固氮法，从而解决了大批量制造炸药的原料

问题的化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也许是同一思路。在今天，像美国这样一个有实力的大国，不能承担国际和平的义务，却致力于将最新的技术发明用于军事。这都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人“以恶致善”的基本取向：不断改进杀人武器与争取永久和平并不冲突。这种“以恶致善”的逻辑阻止了将道德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宪法基础，它放纵形成国家的人群不去进行提升道德水准的努力。这样，不仅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将会遥遥无期，国家之内的文明成果也将毁于国家之间的野蛮冲突之中。

知道“以恶”不能“致善”，也就只能“以善致善”了。这本来很简单，只是在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利用军事强力占据优势后，暂时的利益蒙蔽了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康德式的永久和平道路的弊害，他们的优势地位又使他们的文化成为世界主流，“以善致善”的主张反而显得奇怪了。这也是我对蒋庆先生的回答感到惊讶的另一个原因。事实上，在惊讶之余，我也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们这次对话最有价值的成果，因为它给出了面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性的一条文化原则。它表面上看来颇为无力，但也许是人类走出丛林时代的唯一道路。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并不是人类的最新发现，它本来就在儒学之中，而儒学已经存在两千多年

了。

儒学诞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它当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结束连年的战乱，实现永久和平。它的方案是大一统。但理想的统一者不是武力最强之人，而是“不嗜杀人者”。换句话说，是最具有道德之人。它认为道德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因此要求统治者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在社会制度结构中，儒家倾向于采用非强制性的礼治。因此以儒学的理解，社会就不仅是一组权利结构，还有与人为善的道德文化。据说战国时，有一个叫赵襄子的人，一上午攻下两座城池，却在那里叹息。有人问为什么。他说，我的武功发展很快，但道德却没有跟上，我正发愁怎样统治被攻下的城池呢。这个故事说明他对道德之于统治的理解。在一个社会中，建立个人之间的和谐秩序尚且如此，道德也必然应该是建立永久和平的世界的重要基础。

然而，“以善致善”的主要问题，在于手段上的“囚徒困境”，即和平手段无法对抗战争手段。事实上，儒学并不完全否定使用武力。在一些情况下，使用武力是正当的，如反抗侵略和革命。只是儒学认为，正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反抗和革命的一方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所使用的暴力及其恶果被限制在最低的水平上，例如儒家极为肯定的汤武革命。